

城市中的摊贩：规划外存在的柔性抗争

——以上海市E.高校周边小贩为例

李佳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本论文以人类学为方法、以城市中非正规经济的主体摊贩为调查对象，作者将“街头”视作为城市重要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细致地考察了摊贩作为行动者与“街头”之间特殊关系的形成，并就“街头世界的逻辑困境”、“城市秩序”以及城市底层群体的“柔性抗争”等展开了问题的想象和分析。

关键词：摊贩；非正规经济；街头世界；柔性抗争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1 导论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城市与非正式经济

城市

列斐弗尔把城市比喻为“潘多拉之盒”——里面装满了一系列至今没有解释清楚的矛盾关系。我们一直延续了两条理论上截然相反的路径来理解城市：一个镜像把城市视为地狱、是堕落、疾病、腐败的温床，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就是基于这条路径而展开的；另一个镜像则是延续希腊城邦的传统，把城市视为文明和艺术发展的摇篮。现代城市更多的是这两种矛盾的结合体，在无法理清矛盾之际又接纳新的挑战：城市移民、全球经济竞争、资源紧缺等等。

毫无疑问，现代城市的发展是与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简单看一下美国学术界对于城市的理解就会发现：他们一直试图在以城市为空间，通过规划来扭转或者协调由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载体，城市空间被不断的推翻、重组也成为每个城市政府不可放弃的游戏。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边缘/贫困群体一次次被排斥、也被各级政策一次次所吸纳，但结果却始终逃脱不了被政府“和谐”或者被政治利用的命运。城市规划再次证明一切只是社会控制的机器，而不是寻求社会改变。在“企业家城市(city as entrepreneur)”的另一面，以列斐弗尔、哈维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人性化城市(good city)”以及“城市的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城市最大的危机植根于个人私有产权(personal property ownership)(Lefebvre, 1996)，“城市的权利”必须允许城市边缘/贫困群体(基于种族、性别、阶级)在承认彼此不同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的利益，通过彼此不断交流沟通，凝聚成一股力量——城市不仅仅是作为经济体的城市，城市也是作为社会的城市(societal city)。

问题是，怎样以这样一种视角来诠释目前在上海发展的剧烈城市更新？

近几年，上海的动迁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之一。众多学者以“居住权”为切入点，继而参与到“市民权”(citizenship)的讨论之中，以此回应中国城市近几年所发生的变化。本文

收稿日期：2011-12-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9JJD840003)

作者简介：李佳琳，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选取非正式经济形式之一的摊贩群体（上海）为观察对象并展开论述。随着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除了声势浩大的“动迁过程”之外，整个城市的街道本身、沿街商铺也被一层层地撬开和“粉饰”。摊贩与城管/协管的冲突往往很容易被忽略，甚至被化约为每日在街道上定时定点上演的回旋于“冲摊”与“摆摊”之间的故事。如果说城市动迁是用货币方式几乎把城市里面每个居住者都卷入其中的话，那么同期上演的城市街景改造则来得更为隐蔽，行人们越来越麻木于随处可见的挖道、拓路：皱起眉头、捂起嘴巴并加快脚步离开。但对于以摆摊为“工作与生活”的摊贩而言，那就是每天必须抗争的现实。

非正式经济

“非正式经济”从来就是被现代城市发展模式所排斥的经济形态。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以现代化模式（或者说是“美国模式”）为标准，将原本属于亚洲或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的、天然的经济形势边缘化。在各个国家从事非正式经济的人群通常都是移民、少数族裔、妇女或者儿童，而城市政府、开发商以及规划师一般情况下都是经由男性、中产阶级的视角来认识城市，将城市理解为一个没有性别的、以追求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为唯一衡量指标的空间。根据黄宗智的基本判断：在中国的“非正式经济”就业人员（即：没有工作保障，缺少福利和不受国家劳动法保护的劳工）已占据今天 2.82 亿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中的 1.68 亿，比正规就业人员要多出一倍半。其中绝大多数的从业者都是“农民工”（黄宗智，2009）。在没有正式组织以及各类民间组织（如清末民初的小商贩与同乡会、同业公会等组织之间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大量的从业人员（城市的暂时居住者）是如何运用多渠道的、具有某种可能性的社会资源来维持这种工作与生活的暂时性平衡，继而在这个剧烈变化的大环境中倔强地生存下来，并且没有形成极大的社会动荡成为关注的焦点。

论文通过都市人类学的方式，将街头的摊贩放置于“人物”而非“社会角色”的框架下来理解街头所发生的一件一件事情，并将城市秩序观、市容等概念纳入其中，来理解整个城市的开发过程中在最普通的街头所发生的不普通的场景。

在这篇文章内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 摊贩与街头建立关系的事实：不可见的街头社会结构
2. 街头世界的逻辑困境
3. 对于城市秩序观、柔性抗争的再认识

1.2 研究方法：都市人类学

伴随着二十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兴起，都市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逐步被应用于对于都市本身的研究，研究者们通过参与式观察，从微观的角度来挖掘和解释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的调节和适应问题^[1]。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使都市人类学的支脉涉及到各个角度，大致可以分为：社会关系、经济、都市规划与建筑、宗教与文化等几个方面^[2]。我在此着重指出两点，在“性别化的城市”（The Gendered City）小节中作者提到了都市人类学对于第三世界非正式经济研究的贡献：随着第三世界中女性角色在非正式经济以及城市政治经济非正式化趋势的发展过

1 Anderson E(1990), *Streetwise: Race, Class and Change in an Urban Community*; 或者是 Wacquant LJD.(1994), *The new urban color line: the state and fate of the ghetto in post-fordist America* 就是当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都市人类学著作

2 参阅 Setha M. Low(1996), *The Anthropology of Cities: Imagining and Theorizing the City*. 其中，作者将“社会关系”细分为 The Ethnic City, The Gendered City, The Contested City, 将“经济”维度细分为 The De-industrialized City, The Global City, 讲“城市规划与建筑”细分为 The Modernist City, The Postmodern City, The Fortress City, 而从“宗教与文化”角度将城市分为 The Sacred City 和 The Traditional City

程中的日益突出,在都市人类学领域中进行了大量的对于女性非正式经济从业人员的微观调查^[3],为从性别角度理解第三世界城市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反抗的城市”(The Contested City)小节中提到了那些对于“通过对于城市街头符号性意义的控制,来转换城市权利结构”的都市人类学研究^[4]。在这一系列既有研究资料中,我发觉了丰富的城市研究题材和研究视角,并且运用都市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将“上海摊贩日常摆摊/练摊行为”背后所牵涉到的一系列隐形的属性一并带入观察视角。

2 当摊贩遇到街头——摆摊行为与街头的关系事实

第一次发觉雨天的小贩都蹲在了高架桥下面,这个让人感动和无语的场面:
C D小贩依然开着音乐,几个水果小贩依然在高架下面边做生意,边坐在小板凳上面打牌聊天,顺便吃着凉皮小贩的东西作为午餐。卖包包和手饰的小贩也急匆匆地打包搬到高架下面等雨停。车辆才不会关心下雨不下雨,使劲地按着喇叭,所有的东西都拥挤在了一块,让人头痛想逃……等待雨过天晴,小贩渐渐散回到自己的地盘上去。(2009-6-27,多云,14:00突然一阵雷阵雨)

上面所论述的这个片段也许对于摊贩本身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场景了:象征着政府规划的高架、穿越小绿化带的人行道;象征着公众利益的公交车、川流不息的自行车;象征着中产阶级的私家车、出租车来来往往;还有行人和整个研究的主角——小贩,在那么一场暴雨之时,所有的一切因素都汇聚到了一起,也乱成了一气,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么个让人恼怒的十字路口却蕴含着各种力量,他们用着非言语的方式寻找着自己的缝隙,七转八转的车辆还是接二连三地开过了路口,行人见缝插针地从车流与小贩群中穿越了过去,而摊贩们也权当此为休息的好机会,稍作调整之后,等到雨稍停后又相继摆开做生意。

当流动摊贩穿梭于城市的街头巷尾,他们隐身于来往的行人中,用自己的叫卖声和精心准备的货物吸引目光;当摊贩固定一个摊位在街头的某个角落时,匆匆过往的行人也许并不会注意到,但是,他们不仅仅是在那里摆个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与街头融为了一体。(2009-6-27,多云,14:00突然一阵雷阵雨)

2.1 摊贩与坐铺的关系

通过观察,摊贩在街头的摆摊空间可以细分为三个维度(以校门左边为例):

“第一层小贩摆摊带”:在那里摆摊的小贩通常需要和固定坐铺进行不同方式的协商:

第一类、**人情交易**。在24小时超市门口摆摊的外刊杂志沈大叔,他每天把杂志整齐地排列在超市门口的玻璃窗边框栏上,不需要付任何金钱给超市,也不再“占据”街面空间,拥有令其他小贩十分羡慕的“宝地”。大叔与超市经理的关系很不错。每天摆摊前,他会首先把橱窗擦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再把在家里早已仔细整理过的杂志一一摆放开来。他每天都可以去超市免费借阅报纸看,可以去那里倒水喝,可以免费拿一些处理的冷饮吃,还可以借用他们的钥匙去上厕所。作为“回报”,每当超市里面人手不够时,大叔经常会被“调令”过去帮忙看一会儿店铺。(一次某阿姨买了十几本杂志,问大叔要塑料袋,大叔就帮她花2

3 Harrison FV. (1991) Women in Jamaica's urban informal economy: insights from a Kingston slum; Clark G. (1994), Onions Are my Husband: Survival and Accumulation by West African Market Women; White J. (1994) Money Makes Us Relatives: Women's Labor in Urban Turkey, etc.

4 Kasinitz P. (1992), Caribbean New York: Black Immigrants and the Politics of Race; Kugelmass J. (1994) The Greenwich Village Halloween Parade; Lawrence D. (1992), Transcendence of place: the role of La Placeta in Valencia's Las Fallas, etc.

角钱去超市买了一个；我有几次想坐在地上与大叔聊天，大叔就会去超市取一些不用的硬纸片或者是塑料纸给我垫着坐。）

流动摊点 接近马路（通常为停车道、绿化、车站牌等）
（行人通道）

流动摊点 马路中间的绿化（彼此之间会相隔一定的空间）

第二层小贩摆摊带

（行人通道）

流动摊点 **第一层小贩摆摊带**

固定的坐铺（公家、私人之分）

第二类、**与坐铺沉默地协商**。E. 高校的房产、旅行社、继续教育学院或者是邮局等，都是公家的坐铺，有着非常固定的营业时间。每当下午 17:30 那道铁门被拉下的时候，原先的空间就在瞬间消失了它的商业意义^[5]，这个时候小商贩就可以抢占位置，打开小箱子或者是在地上铺上一层塑料纸，熟练地摆放开各式货物，在瞬间彻底改造了整个街景，那个时候，其背后的铁门反而如墙壁般成为小贩的背景了。

第三类、**纯粹的金钱交易**。每一个月付私人坐铺一定的金额，用口头承诺的方式购得某一时段的摆摊权利。时间一到，摆摊的空间就自动消失，复原给了沿街而坐铺。所以，每次摆摊前，小商贩们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卖早点的，早早地就会在家里把面粉活好、塑料袋整理好、零钱备好，到点就卷起袖管做起生意，那种架势如同演员到时间点亮相舞台一般——“功夫在戏外”。

大叔与超市的关系，不是花钱租空间做生意的买卖，而是一种长久的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的交往模式。这种交往模式显然更加容易产生出一层一层丰富的关系（在几周前的一次路面全面整修的进程中，只有大叔的摊位倔强地依靠着与 24 小时的关系而摆放着，这种人情关系的边界是模糊的，或者说是有无限延展性的）（见图 1、2）。与坐铺的沉默协商或者是单纯的金钱交易换取空间，相比而言是一种刚性的关系，他们首先顺应了街头原先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又用自己的方式创造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一旦每日实践之后，也就成为了一种模式和常态。街头的活力就在于这种**柔性关系与刚性关系**的交叉和互相融合之中。

当然，小贩与坐铺的关系并非总是那么融洽，E. 高校左边路口处的杂货店就经常会打举报电话，有时候是因为小贩占用了他们的门口，有些时候是因为小贩销售的货物与他们店里的产生竞争。杂货店会特意用硬板纸在自己的门口和外橱窗旁边围成一个圈，这种对于街头占用的方式与小贩如出一辙，也极其类似于老式小区居民为了占据楼层的公共空间而故意摆放一些杂物的做法。在法律无法清晰界限化公共空间时，各种力量会用某种相似的方式彼此博弈，而对于权力资源占据资本较大的一方则更会利用正式的一些政治手段扩大自己的地盘。

5 正如马路边一个被闲置的建筑工地，由于资金不足，施工到一半便被“扔”在马路中间。这个时候，那个原先建筑物的意义就消失殆尽，于是就有拾荒者、爱玩耍的小毛孩陆陆续续地进入内部，彻底改造了那个空间原先所预设的意义。



图1 整修前沈大叔摊位



图2 整修期间沈大叔摊位

2.2 摊贩之间关系的建立——以书贩的世界为例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书市，它们分布在不同的角落，吸引着不同的人群，二、三十年代的弄堂口小书摊、文庙的二手书市场以及福州路的文化一条街都是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记忆，而当下教育文化变化所孕育出的盗版书、教辅书等市场同样满足了很多客观需求。有意思的是，E. 高校门口汇集着不同种类的书摊，满足了不同读者的口味，形成了一个相异却互补的氛围。

与我第一个建立起关系的是在 E. 高校门口摆放外刊杂志的沈大叔——身材不高，喜欢戴帽子，外表看上去很严肃，其实却非常热情。他每天要看许多份报纸。做事情踏实、仔细。语出惊人。坦诚。

沈大叔在 E. 高校正门口卖外刊杂志已经有五年多了，主要经营：Time, The Economist, Newsweek, Natural Geography, Le Point, Read Digest 等等，基本上以周刊为主、月刊为辅。他的老婆在家里小区附近摆摊卖小东西（从城隍庙批来得小货物：比如各种木梳、指甲钳等等）。在此之前，他们夫妻两个人在附近的一个购物中心、在学校后门“一条街”也都曾经摆过一段时间的摊。最后，通过一系列的排斥和接纳，沈大叔才慢慢开始在高校正门口固定下来。五年前这块地盘是一群安徽帮摊贩主要活动的地方，大叔一开始在这里打游击，今天这里摆摆，过几年又在校门口的右边（现在大型超市那边）摆摆。打游击的日子虽然不稳定，却也提供了一个还很好的与一些小贩慢慢熟络的机会。一次，一个安徽人突然要离开了。大叔得到了其他“安徽帮”成员的同意，在走掉的那个小贩的地盘上开始了第一次固定的摊贩生意。后来，又有几个安徽人不做小贩了^[6]，大叔的地盘越来越大，一直到现在长期固定在超市门口，并且与超市建立起了稳定的关系。这一切看起来并不比在职场上打拼来得简单。之所以现在只有他能够继续在完整的时间段里做生意是因为他没有“占道”——他是把杂志放在好德超市的橱窗口的边栏上，这样一来他占据的是超市空间，与政府定义的公共空间无关，对于这个交界地带空间的运用便转换成了如何建立与超市的关系了。大叔与超市经理的关系不错（详见第一节中的描述），作为“回报”，每当超市里面人手不够时，大叔经常会被“调令”过去帮忙看一会儿店铺。

6 根据大叔说，那些离开的小贩往往是随着孩子去了其他城市或者去小区当保安或者保洁员

“我和好德超市里面的人关系很好的。我要保持他们外面的干净，帮他们打扫卫生。不用付钱的。”

大叔杂志的来源是通过他儿子在海关的一个朋友帮忙。每次路过的新顾客首先会质疑杂志的正版性，因为他的时代杂志几乎与美国当地同时上市。但是，翻看纸张和内容后，大都会信服。

“他（大叔的儿子）的一个大学铁哥们是海关做的，他们海关专门有个箱子可以运内部东西的，这个杂志就是每周从浦东机场运过来的。他那个铁哥们说，让你老头子做做这个杂志生意蛮好的，外面买很贵的，这里直接弄过来就非常便宜。我这才做这个外语类杂志生意的。每周浦东机场都会把东西弄到市区，然后我们三个人分，另外还有两个有关系的人也在做这个生意。”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内，大叔与不少的 E. 高校学生建立起了长久的生意关系，以及更有意思的长辈-晚辈关系。在我观察期间就认识了这么一位同学。E. 高校研三的安徽男生（国际政治系，今年顺利求职于某家国企银行），听大叔说之前他性格比较内向，现在越来越充满自信。他每周六中午都会到摊上买 The Economists, Times 等等最新杂志，并且与大叔聊几句：

“对于我来说，大叔就像一个长辈一样。我找工作时经常会咨询一下大叔的意见。其实，这些杂志图书馆都有借的，但是没那么新。他这里的真得非常新、非常及时。大叔人也很好，有几次他周六没出来，都会提前给我打电话。甚至我过年回家时，他还答应把杂志邮寄给我……我就是喜欢拿着英语杂志，开我的小电动车来到永嘉路、上图周边慢慢看，我每期都很认真看，非常有意思，而且很有助于我的英语能力和我的国际视野”

大叔喜欢讲述不同学生顾客的故事：外国人、求职顺利的毕业生以及一些不怎么被大叔看得起的学生。他每次点钱的时候都特别认真，尽管他不懂任何英语，却还是可以凭借自己对于封面的解读以及各种报纸国际版面的信息，游刃有余地经营着自己的小角落。

去沈大叔摊位次数多了之后，我逐渐注意到离开他仅仅几步路的一位卖二手书的摊贩（比如：唐诗宋词类、毛泽东选集、文革时期的报头、各种小册连环画、旧时的杂志期刊、资本论）。很奇怪的时，沈大叔并不喜欢他，说他思想比较保守、比较偏激。只到有一次，那位二手书大叔主动上来和我说话，我这才慢慢解了他。

二手书大叔姓董，戴着边框镜，非常斯文，上海人，卖二手书已经 10 年了，在此之前是搞钱币收藏的，后来由于国家政策原因^[7]，转卖二手书的生意（在文庙）。原来文庙一个月的摊位费用是 30 元钱（2001 年），后来书市管理方觉得有利可图，就把摊位的日租金涨到 80 元一天。他渐渐觉得生意难做，就开始在外面打游击。大叔在外面打游击卖书已经 5 年了，在 E. 高校这边也有 2、3 年了，一开始在旁边的小学门口，后来在大型超市那边，最近几个月一直固定在沈大叔旁边 67 路等的站牌口。

7 1997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的通知》。同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非法买卖人民币的通知〉的通知》，对“非法买卖人民币”的政策界限作了具体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有关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包括纪念币）；经营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装帧和经营装帧的流通人民币。后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2006 年 2 月，黄浦区文化行政执法大队启动文化、公安、工商、城管等联合整治行动，严厉惩治“路边书摊”，还打击那些卖盗版书的摊位。

他经常这样说：

“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看。别人都说文化大革命不好，我觉得当时的有些方面还要比现在社会好。现在社会经济是发展了，可是社会问题却也越来越多”

董大叔在退休前就一直对于买卖旧书感兴趣，“旧书很有味道，你看这个书的‘色面’……”。对于他来说，做这一行一来需要有运气回收到比较好的书；二来要有机会遇到识货、懂行、有需要的人，这样才有意思（无疑，高校周边，尤其是以文科见长的 E. 高校周边是很好的地角）。经常会看到他饶有兴致地与感兴趣的买者砍价，**这期间的利润空间完全由他自己掌握**，而在这一笔笔生意中，董大叔小小的骄傲感和难以抑制的尊严感显露无疑。

董大叔与沈大叔极少单独讲话，尽管只是相隔短短的几步路，彼此之间却有着不可接近的隔阂。

摊贩	“不可见”的资源	“可见”的资源	“不可见”关系的产生
沈大叔	本地人；儿子的人脉关系所带来的货源渠道（免去海关税）	外语考证、留学成风、都市学生族对国际性刊物的向往	长辈——晚辈关系的产生与维系
董大叔	自钱币买卖以来积累起的人脉；淘旧书所花费的成本；每个月退休金的基本生活保障	旧书市场的存在；E. 高校师生成为源源不断的消费者	读书趣味的叠加使“买者”也可以成为摊主的“卖者”，如此不断循环，彼此吸引
“盗版新书”摊贩	统一的地下印刷、制书市场，老乡群体的人脉	由于版权、版税制度而造成的正版书价格昂贵；公共图书馆的不完备	对于底层百姓“街头图书馆”的再次形成，题材实用且流行。与上海二、三十年代街头的小人书摊位很像，但是背后的原因却不尽相同

在 E. 高校正门口还有三辆卖盗版新书的“黄鱼车”（根据我的观察，穿梭于上海的各辆“黄鱼车”书贩通常销售的有以下几类：医疗养生类、职场类、理财类、外语原版新书、奇幻/侦探小说、当季流行新小说）分别摆放在正门左边、正门右边的大型超市门口以及正门马路对面的车站旁边。正门左边的安徽书贩已经在这里摆摊很多年了，卖盗版书也很久了^[8]，沈大叔和他有些交情，偶尔会去换零钱。我曾经借着沈大叔好友的身份向这位安徽书贩打听消息，他告诉我：他们都是通过熟人认识进货的，自己在外是找不到生产地方的。这位安徽书贩之前是在工厂里面打工的，后来听几位工友介绍才开始做卖书的生意。摆摊自由——正如他说的：“至少我一边‘上班’一边可以看看闲书、肚子饿了可以吃吃饼干”。大型超市那边^[9]是位上海人，精明、会做生意。某天一个顾客问他：“这些书质量有保障么？”

8 自从 2010 年 1 月开始，由于盗版新书生意不好，而且在城管管制时推着书逃起来也很重，所以改卖比较轻便的包包、偶尔也和老婆两个人卖小吃。

9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大型超市内部广场摆摊的都是上海本地人，而被挤兑在广场外面的都是外地人，这位经营盗版书的上海人那里已经很有名气了。

老板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个书看看多实惠啊，我保证一个字都不错！”根据我的观察，就三辆“黄鱼车”而言，这位上海大叔的生意最好，也最会做生意。他家就住在 E. 高校旁边，经常可以骑着电动车回家源源不断地运来新书。最后一位卖书的小贩长期在马路对面的车站旁边做生意，从来没有来到过学校正门这边，即使是在城管/协管员管制期间。

2.3 摊贩与其他街头人物的关系：两则故事

关于一伙新疆小偷的故事：

在与一些小贩的闲聊中，听到大叔讲到了几天前的一个故事。前几天，几个女学生在沈大叔摊上挑选杂志的时候，有几个新疆小偷想偷手机。大叔直接指出来，“坏”了小偷的如意算盘。

很多人问大叔，“不怕她们找人报复？”

大叔告诉我，他是这么和那个新疆小偷交涉的：“你看，你们偷东西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们。可是，那两个学生在买我的杂志，你偷了他们的手机，他们发现后，哪里还有心情来买我的东西。你这不分明是抢了我的生意么？这个不行的。你们在这里做你们自己的生意，我也在这里做我自己的生意，我们各自做各自的，互相不能影响的。”（2009年10月16日 17:00-19:00）

当所有正式的规则都暂时隐身时，街头世界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场景。街头上**不可见的关系**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得以维系着。毫无疑问，小偷小摸是街头不可避免的一幕幕戏，以那里为工作场所的摊贩自然会比匆匆而过的行人更了解这个事实。城管、协管人员并没有职责去制止小偷，而且小偷活动的时间段也一定是“两管人员”下班后，整个街头热闹起来之时。摊贩的摆摊行为不仅仅依赖于消费者对于商品或者服务的信任，更是依赖于对于整个街头系统的一种信任^[10]。相比于用强硬的、正式的警察(criminal laws)对付小偷小摸(minor disorder)这样的行为，街头自发形成的这种制衡逻辑使小偷在被否定的同时，还被给予了一份尊重。

流浪汉的“一根烟”

在 E. 高校门口田野久了，我渐渐注意到在高架下的一个破屋里一直住着一位流浪汉，那是他固定的“家”，他靠捡垃圾为生。我听沈大叔、小杜讲过不少关于他的故事：关于他为什么会选择“流浪”，为什么会 在被居委会请回家后再次“流浪”到了这里。真得对有些人来说，街头会比家来得更加自由？

今天当我与沈大叔聊得真欢时，“熟悉”的流浪汉慢悠悠地走过来问大叔借个火。我看到他好几年没有梳理过的蓬乱头发，散发出一阵怪味的衣服，低下头，不用一句话，把捡来的半只烟头吊在手指间，向大叔使了个眼色，头微微一斜，万般舒心地吸上了一口烟。随后，满意地向大叔微笑了一下，直起腰杆，不顾众人的眼光，抬头仰望天空享受着难得的吞云吐雾的乐趣。（2009-7-6）

听沈大叔说，有次借火时，那位流浪汉不仅仅说了声谢谢，还说“听说某某地方的后门不能摆摊了……”。原来，每个工作或者生活在街头的人都彼此关注着对方，在固定的区域内，无需言语的在场形成了雅各布斯笔下的“街道之眼”。只是，“街道之眼”越来越成为正式城市管理驱逐、排挤的对象。我见到过好几次行人向沈大叔借火、问路的。在一个人口

10 正如经典的论述所提到的：为什么我们买票后就会默认公交司机一定会把我们带往目的地，而不会有任何怀疑？这背后是对司机这个职业，对整个公交系统和国家的信任。

异质性越来越强的社会，不安全隐患随时存在的大都市，在上海即将转变为一个被完全严格监控的社会之前，陌生人之间平实的沟通依然在日常生活的隙缝中维系着。

3 街头世界的逻辑困境

其实即使是摆摊近十年的老摊贩，对于城管、协管员的管理时间的把握也难以做到十分精确。基本上，小贩会在中午 11:00-13:00、下午 17:00-20:00 在正门口摆摊，晚上九、十点之后服饰小贩会转到 E 高校的后门继续做生意。所以在下午接近 1 点左右，一些小贩就会陆续收拾东西回家（或者到其他地方），然后到下午五点左右再陆续出来。

3.1 小贩、“两管”、行人的逻辑

周六的校门口往往比较热闹，往左边望去，几辆黑摩的一边互相聊天，一边四周张望着随时可能从眼皮底下溜过的生意，一个报亭和一个彩票亭面对面矗立街道两边，两位阿姨彼此非常熟悉，经常会“大声”聊天，除此之外，就是排列整齐、一个摊位紧挨着一个摊位的小贩市场，他们通常集中在“第二层摆摊带”——小吃饭打头阵，从寿司卷到各类油炸小食，紧接着就是各种小饰品和各类女装的摊位。尽管没有任何正式的秩序规划，小贩还是排列地非常整齐，关系好的都会排列在一起，货物相似的会自觉地隔开几个摊位摆放，生意清淡的时候相邻的摊贩会彼此交流一下老家的事情，各自的子女，生意热火的时候有些小贩就会很“低调”地向关系的搭档说“又做成一笔了...今天我已经卖出.....”（那些时候，总能从他们的脸上读出踏实的自豪感）.....当我在沈大叔摊位正聊得很投入时，突然旁边传来一阵声音“快点...快点...”只见小贩手脚麻利地一边整理东西一边朝着校门那边张望...“在哪里？”“那辆车你看到了伐？从学校里面穿出来的，停在校门口呢？”原来，现在城管的车会在学校里面停一段时间，或者是从后门经过学校从正门口绕出来。“怎么还没过来？”我问小杜。“他们一般会先查那边靠近超市的地方，然后再过来。”只见好几个水果小贩开始推着车往反方向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卖女装、饰品的小贩把铺在地上或者是挂起来的衣服都收起来塞进大麻袋里放在各自的小摩的后面，他们并不会马上开车走，而是互相等着城管、协管人员慢悠悠地走到跟前，随后再象征性地开着小摩的绕出去一圈.....大概十分钟后，“两管”人员向我所在的地方逼近了，一些小贩开车走人，小付把东西停在街边，自己边看边让人聊天，小杜转移到后门，沈大叔把移到地面摆放的杂志复位到超市橱窗边上.....只见一个城管人员走到一个卖碟片的摊位聊起天来，摊主递给他一根烟，然后神态自若地介绍着新近的碟片、听着城管人员“传达”最近管辖的松紧程度（听小付说，这位摊主与城管关系好，交过钱的，所以摊主也就和城管神态自若地站在一起，用几乎同样的眼神看着其他小贩逃窜的样子）.....小付和手机贴膜的小王在聊天，一个比较熟悉的协管大叔走进他们说：“收起来，收起来，怎么还在做生意？”“马上...把你的衣服脱下来我穿上，我就变成协管了...”小付一边笑一边插科打诨...“是呀，现在嘴巴硬嘞，刚来的时候哦...”其实，新来的小贩肯定会惊慌，因为他们根本不会知道这个地盘的小贩之间、小贩和“两管”人员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自然也不会怎么处理这样的场景，稍有经验的，比如小杜、小付这样，就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他们并不显示出自己害怕“两管”人员，但是肯定会收起东西（害怕被没收东西再去“赎回”的过程）.....

城管走后的十五分钟之后，小贩又互相联系，陆续摆放开来.....（2010年4月3日）

每一次“两管”人员过来，小贩们都会“消失”——东西重的转移到附近弄堂内，有摩托车跑得快的会到附近的其他地方做生意，还有一些就直接收起东西，然后闲逛在街头和人聊天，等着管理人员离场。

首先，在整个田野过程中，经常会听到小贩们说“他们就是穿着衣服做强盗，共产党的形象就被他们这帮人给破坏了…”、“我每月挣的钱比他们还多，他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还不是要靠我们”、“抓的人不在了，他们只是站在那里而已，不抢东西的”、“我不怕，我有消息的。他们来我就逃。总能够找到时间做生意的”、“‘现在’他们不出来，他们在休息……”、“今天他们考公务员去了……”、“家里没事做，在这里可以和不同的人接触。蛮有意思的”、“摆摊自由……”

对于小贩而言，一方面他们不断地宣称：“我们是弱势群体、我们是底层；我们有权利选择‘自由’、有权利不选择长时间、低收入的城市工作”，从而获得一种道德上的正义感；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时时刻刻意识到“我们的行为被认为‘不符合城市法律条款’，我们的行为被认为‘影响市容’”。这种逻辑上的困境根深蒂固，他们不会去深究“法律条款”规定了些什么？到底什么行为算是“影响市容”，同样他们也始终会用“弱势群体”、“底层”等政治色彩的词汇标签化自己。

其次，近几年关于“两管”人员的媒体评论、从职业道德的角度进行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这个群体本身就成为了一个中国式的特有产物，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在此，我仅引用一些针对小贩的“两管”人员的话语：“影响市容”、“违章设摊”、“我们也没有办法，讲不清楚，这是我们的工作”、“出来了就是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放些小道消息就可以省得我们自己管，这些个摆摊的自己也会比较自觉’”。

“两管”人员的职业设置本身就是在一群人去填补一项法律的灰色地带，也就是说将依法衡量行为的客观性准则转变成了依靠人本身来酌情考虑的主观性调节，而工作本身的政府委任性又有着表面上无可争议的正当性。正如“两管”人员有时候会提到：“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按照上面的指示办事情。我也知道小摊贩们摆摊生存不容易，也知道很多人需要他们的东西。但是，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办法”。

最后，由于世博会的临近，整治小贩成为城管局、环卫局每天必须重视和报道的话题。而学校门口的设摊行为更是牵涉到教育局和学校本身的保安部门等等。对于学生族而言，门口的摊贩市场是学校生活的真实延续，“一出校门”就满足了他们各方面的客观需求。但是，对于其他匆匆而过的行人，就未必会接受。

今天与一个路人聊了一会儿，她原来以为我也是摆摊的，就说话非常直接，是江苏扬州人，是E.高校生命科学学院的教职人员，但是心中却充满了对小贩的不满。她说：小贩占用了人行道，国家新闻里面说的，人行道不能摆摊，会影响路人行走的。现在规定，城管只要看见摊位就可以收摊。前几天一个DH大学的学生吃了一个摊贩上的东西，得了肝炎。知道么？肝炎是一辈子也不会好的。国家不让摆，就不要摆了。找些事情做，找不到就回老家种地去。国家说了：土地不能荒着。种地不挣钱，国家不是现在补贴吗要，接下来粮食要涨价、水要涨价、电要涨价…什么都要涨价，看那些人在上海怎么活下去。那么多人到上海了，不能每个人都到上海政府负责，应该回老家去，让当地政府负责解决生活问题。(2009年7月9日，17:00~19:00)

作为普通市民，在大都市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于陌生群体的类型化而获取安全感。而媒体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政府说不能摆，就不能摆，影响市容”、“影响大家走路……”、“国家不是说土地不能闲置么，他们为什么不回家种地？”

从这个简单的对话中，就可以发现行人的逻辑：虽然喜欢逛小摊，喜欢逛集市，但是，不希望小摊摆在“我”家门。

3.2 逻辑困境的极致体现：路面整修的一周

今天下午1点左右来到E.高校正门口。其实上周五，当我看到好又多超市那边的人行道全部被改建，竖起了“景观工程”的牌子，就有某种预感：感觉到最近这边会有不少变化。果然不出我所料，钻出龙之梦地铁站搭上67路时就意外发现，沿着龙之梦一圈全是一个一个小贩。之前从来不会这般的——小贩的总量其实不会锐减，他们只是到处集体转移，龙之梦这里“非正常化”地聚集了那么多，肯定是其他地方不能摆摊的结果。来到学校门口，彻底惊呆了。全都变样了。E.高校两旁的街道上全都在整修，一个小贩都看不见，来往的行人也只能绕道而走，唯有修路的工人忙得不可开交，被“困”在里面的坐铺也生意清淡了很多。



(整修路面)



(夹缝中“挤”出来的摆摊空间)

只有沈大叔一个人在那里摆摊，还是因为他和24小时之间的关系，让他倔强地坐在超市门口的一个角落里面，而另一个角落里面就拥挤地摆放着最好卖的几个杂志种类。大叔说，最近这段时间管得非常紧。

“那这里修路前有通知过你们么？”

“没有，我们算什么。他们和超市里面的人打过招呼的……”

“那小杜、小马他们去哪里了？”

“家里吧，我也联系不到他们现在。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也不知道这里什么时候才可以修好？好又多超市那里在搞什么呢？”

“修路，和这里一样吧。你看，这些石头、沙子什么的都是那里运送来的。政府贪污就挖路，不挖路怎么能够贪污呢？这里的路一年多之前刚刚铺过，这不是明摆着在浪费钱么……”

这个时候A大叔走了过来，A大叔摆摊的历史和沈大叔差不多，一直卖小吃的，双休日他老婆会出来帮帮忙。A大叔刚想说什么，看看我，就把话收了回去，沈

大叔说我是他亲戚，这才使 A 打消了怀疑，放心地说：“听说前段时间普陀区被评为倒数第一还不是倒数第二，区长不开心了，所以要整治... 过段时间排名上去了，估计会管得再松些... 你说这路，一年多前刚刚弄过，真是在瞎用钱.....”（2009 年 12 月 19 日）

在那一周的路面整修期间，行人依然不能够顺利地穿走街道，却不是因为小贩的占道；小贩几乎找不到摆摊的空间和时间，却不是因为“两管”人员的严厉驱赶；“两管”人员也不用轮流站岗，没有小贩的街头似乎也就没有他们存在的必要性了。之前一切的矛盾是否真得意味着都不存在了？

3.3 对于两个现象的思考

小摊贩与“爱心帮帮车”

“爱心帮帮车”最早是由普陀区长寿路街道率先试点的，其目的除了辅助底层本地市民就业、将其纳入正式经济系统内，也是为了帮助解决该区无证摊贩点乱设摊与城市市容环境之间的矛盾。该项目由政府扶持，特色是有一定的条件、货源统一、有统一时间、车主每月有固定工资。从物理空间上来看，“爱心帮帮车”对于街道的占据方式与街头任意一个早餐摊贩几乎没有差异，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政府背后的扶持，这种对于自生力量的压制不仅仅成为树立政府形象的手段之一，并且也非正当化了其余占用街道做小买卖的行为。

E. 高校后门坐铺的抗议

2010 年 3、4 月份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地听小贩们聊到 E. 高校后门要整体拆除的消息。仅仅在半年前，那条街面经历了一次为期两个月的大整修，现如今沿街商铺也要一概被拆除。根据我的了解，沿街商铺的土地所有权归 E. 高校所有，由于高校扩招，学校用地困难，决定收回原来的商铺用地挪为他用。一时间各家商铺纷纷挂出了横幅、标语表示抗议（“请给我们吃饭的权利”、“桃李满天下，蛮行算几许”等等），学生之间也纷纷扬扬地传递这样的消息，共同形成一种非常荒诞的场景：抗议的横幅尤挂，商铺生意照做，小贩依然寻找着各个时间段的机会摆摊，问起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正式不能摆放了，谁也不清楚，只是回答：“我也不知道，快了吧，到时候看吧”。

我们几乎不会看到小贩公开挑战沿街商铺的正当性，但当沿街商铺与学校单位之间存在不公平的冲突时，那些以公共价值为依托的横幅就会出现。学校单位与开发商、坐铺与学校单位之间存在着唇齿相连的关系：城市政府与规划部门可以不止一次地逼迫学校迁向城市郊区；学校用地的扩张也会与坐铺之间形成激烈的利益矛盾... 相比之下，街头小人物所构成的世界就显得更为不正式，却更为“有机”。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布迪厄在某些“无意识”层面的解释来理解这些现象，所有这些街头人物并不是都在“理性”层面参与到日常生活的，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与各自的“心智结构”之间调适和磨合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政治效果”（布迪厄，1986）。而这之间的磨合过程确实给现今的底层群体创造了进行柔性抗争的可能性空间。

4 问题发现及讨论

4.1 城市的秩序与秩序观

丹尼尔在 Sidewalk 最后提到：“什么是秩序？秩序不能被作为目的本身被推崇，反而，秩序应该是一系列社会规范的副产品，而社会规范应该建立在对于生活本身复杂性的充分认识之上。城市不应该因为人行道的拥挤就建立过于僵硬的标准，一些判断仅仅是想以人行道

的拥挤作为借口将小贩驱赶出高租金的区域 (Duneier,1999)。”^[11] 尽管该书的田野在美国纽约,但是操作的逻辑却是惊人地一致。从现实层面看,我们很容易理解:每个市民都希望有良好的市容、秩序,比如“整洁”、“有序”。在“世博会”的名义下,“市容”这样一个价值理性的概念被转变为工具理性的观念,运用于各个层面的政府开发城市行为当中,并借此获得正当性的空间,就会产生一些让人无法解释的区域。

一个城市的秩序是一种客观存在,而秩序观则是一种“叙述”、一种“划界”。“所有的描写都不仅仅是一种固定,而是在文化上有所创造。”当所有必需的条件聚集起来时,叙述甚至具有配分功能和操演力量。它成了空间的建立者。反过来讲,叙述消失(或者其陈述事物的能力减弱)之处,便同时存在着空间丢失:失去了叙述,集体或个人就倒退向某种令人不安的,关于一个畸形、模糊、昏暗的总体的宿命论经验。城市先生产出一块“洁净的空间”,从而理性机构应该驱逐所有可能连累这项生产的,物质上、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污染。在整个过程中贯彻的制度行为,也是一种分类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让人知晓有这么一种存在,然后经由这一知晓使人产生区分,亦即界感。而人们对于这种分类抑或制度进行了一种识别(并非是理解)(德·塞托,2009)。正如戴维斯所提到的:在第三世界城市中,贫民害怕备受瞩目的国际事件,这些都会使得当局发动对城市的清理整顿,而他们很清楚自己就属于政府不希望世界看到的“肮脏”和“颓废”(戴维斯,2009)。城市美化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创造一种城市物质空间的形象和秩序,来创造或改进社会秩序,恢复城市中由于工业化而失去的视觉的美和生活的和谐。上海“世博会”期间的城市大开发都被赋予了不可阻挡的正当性,在这个契机下对城市空间重构进行“叙述”,借用并强化了城市秩序、城市美学等概念。对这些概念进行“叙述”的主体性缺失,让市民(尤其是如小贩、“两管”等底层老百姓)与其本身的许多识别产生矛盾和困境,进而在一系列荒诞的场景中彼此维系着相互关系。

4.2 “柔性”抗争的空间创造

列斐伏尔在20世纪60年代起发表的“城市的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空间与政治”(Space and politics)、“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掀起了一场以城市空间为研究路径的讨论,而现今世界各地活跃着的关于“城市的权利”的讨论和运动,也是以此为基础。传统的赋权(enfranchisement)确实给公民(citizen)一定的权利参与到资本对于城市的决定过程中,但是这种“正式的”权利依附于国家公民的身份。与此相对的,他关于“城市的权利”是建立在城市的居住者的身份上。这里“居住者”意味着:“城市的权利”来源于在城市空间中日常工作与生活的一系列实践(Lefebvre,1996)。换句话说,按照我的理解,来源于一种“日常生活的抗争”。这也是近几年城市社会学以上海作为田野所围绕讨论的核心话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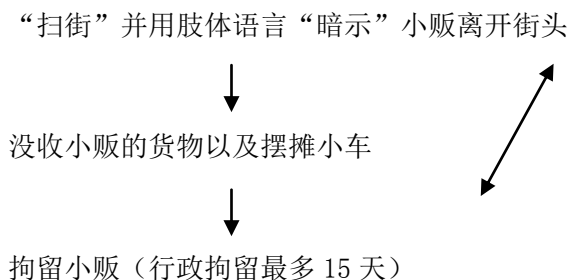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在大量关于非正式经济讨论文本看到这样的场景:商贩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商贩与店主的关系也日趋白热化,在极度竞争的情况下,当利润降到逼近生存线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以种族或宗教予以区分,并引发激烈的冲突。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奇迹”受到世界的瞩目,但是九亿中国农民和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大量非正式就业形式的存在,充分说明了在进口替代工业化努力受挫后,没有伴随着全球化而进一步工业化(全球化的本质其实是金融化,而非工业化),而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也许我们应该庆幸49年后在农村所实行的土改,让每家每户分到了田地,尽管务农的收入十分有限,但这几分自留地以及家里的亲人却是无数个背井离乡、在城市里颠沛流离的心灵归宿。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11 原句为: What is order? Order must not be prized as an end itself; rather, order is a by-product of a system of social regulation that is grounded in an understanding of city life in its uneasy complexity. Cities should not establish too rigorous standards for pedestrian congestion, and judges should be careful of efforts to use pedestrian congestion as an excuse to eliminate vendors from high-rent districts.

本研究中的“柔性抗争”指认的就是小贩身上那种运用和激活城市中不可见的资源，来维持自己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在被卷入城市大开发进程的同时发觉自身可以活动的空间，继而确保了整个城市中这个庞大群体的相对稳定。

正如摊贩会用时间的延长性来弥补偶尔的空间局限性、会沿着两个区的交界处出来做生意，“柔性抗争”往往存在于各领域规范外的边界上。一方面，西方国家拥有不同的政治方式，当现实与法律出现冲突时，国家会通过调整法律条款本身来重新界定与规范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而在中国现实状况并不容许这么做。中国的法律现状是刑法最为发达，这就引发现城管暴力执法，市民对于冲突的关注程度也被提升到了要施暴才会引起注意。^[12]

对于小贩的处理：



行政拘留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处罚手段来惩罚和教育违法者，从而防止违法行为的再犯。但是，由于目前法律条款的缺失，很多情况下执法部门只能以“游手好闲”、“影响市容”等罪名来没收货物或者是拘留小贩。如此循环多了，双方之间的关系也就会慢慢发生改变，在知道彼此底线之后，大家都开始在中间的维度之内寻找自己的动弹空间。周雪光曾经提到：“在村落社区里，某种社会观念、社会期待和期望规则一旦被广为接受，就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事实，具有道德力量，从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如果有悖于这些‘社会事实’，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因而可以更确切地把社会情理合法性机制看作是一套社会承认的逻辑和合乎情理的逻辑(周雪光, 2008)。”城市里的底层市民沿袭了这个习惯，这不仅仅来源于社会转型期间很多部门的错位、缺位设置，更是由于长期的错位与缺失反而促成了如小商贩们认受规则后再寻找突破口。在规划之外的空间内，在不完全合法却合乎情理的空间内充满着各种实践的逻辑，如同法律（作为一种文化模式）一样，合乎情理作为另一种文化模式依次赋予最强大的力量以“合法性”，移动它并推动它。这是对隐藏的暴力提供的象征性的平衡以及或多或少暂时性的和解。弱者为了利用强者所采取的机灵方式，从而为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增添了一些政治色彩。

参考文献

- [1] 艾略特·列堡,李文茂,邹小艳译. 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 [2] 埃德蒙·利奇,郭凡译. 文化与交流[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3] 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汲吉译. 原始分类[M] 上海: 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5.
- [4] 安·格雷,许梦云译. 文化研究: 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 [5] 陈映芳等. 都市大开发: 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2 比如: 2009年7月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发生的城管暴力执法事件最终于2010年4月通过闵行区法院的司法途径得以解决。

- [6]陈映芳. 城市社会：难以接近的和隐蔽的[J]. 社会, 2003(4).
- [7]大卫·哈维, 黄煜文译.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8]丁金宏. 中国对非正规就业概念的移植与发展[J]. 中国人口科学, 2001(6).
- [9]菲利普·布儒瓦, 焦小婷译. 生命的尊严——透析哈莱姆区的快客买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10]黄宗智. 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J]. 开放时代, 2007(4).
- [11]黄宗智.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悖论的社会形态[J]. 领导者 2008(6).
- [12]黄宗智. 中国被忽视的非正式经济：现实与理论[J]. 开放时代 2009(2).
- [13]刘健芝, 萨米尔·阿明等主编. 抵抗的全球化[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 [14]卢汉超.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15]流心. 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系谱[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6]李三星. 发生在 60 年前的上海摊贩事件[J].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07(2).
- [17]冷熙亮, 丁金宏. 城市非正规就业发展及其问题——以上海为例的探讨[J]. 社会 2000(11).
- [18]刘拥华.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J]. 社会学研究 2008(2).
- [19]迈克·戴维斯.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M].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9.
- [20]米歇尔·德·塞托. 日常生活实践：1. 实践的艺术[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21]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感[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 [22]施芸娜. 机会空间的营造——以 B 市被拆迁居民集团行政诉讼为例[J]. 社会学研究, 2007(2).
- [23]夏铸九, 王志弘. 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M]. 台湾：明文书局, 1993.
- [24]王笛.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25]威廉·富特·怀特. 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 [26]姚胜祥. 震惊中外的上海摊贩抗争运动[J]. 党史纵横 2008(1).
- [27]姚胜祥. 1946 年上海摊贩抗争运动始末[J]. 党史文苑 2007(6).
- [28]詹姆斯·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29]张弛. 浅析韦伯学说中的“正当性”[J]. 江淮论坛 2007(3).
- [30]张登德. 论陈炽《续富国策》中的富国思想[J]. 理论学刊 2007(9).
- [31]周雪光. 合作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M]. 社会学研究 2008(3).
- [32]Bourdieu, Pierre.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it's the text of a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UCSD in March), 1986.
- [33]Clara Olmedo, Martin J. Murray. The Formalization of Informal/Precarious Labor in Contemporary Argentina[J].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02, 17(3).

- [34]David A.Snow ,Calvin Morrill.Elaborating analytic ethnography: Linking fieldwork and theory[J].Ethnography ,2003 (4).
- [35]Dalton Conley , Miriam Ryvicker. Race, Class, and Eyes Upon the Street: Public Space, Social Control, and the Economics of Three Urban Communities[C]. Sociological Forum 2001,16(4).
- [36]Duneier, Mitchell.Sidewalk[M]. U.S.A.: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0,
- [37]Duneier, Mitchell.Talking City Trouble: Interactional Vandalism,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Urban Interaction Problem[J]. AJS ,1999,104(5).
- [38]Duneier, Mitchell.What Kind of Combat Sport is Sociology[J]. AJS ,2002,107(6).
- [39]Duneier, Mitchell.Voices from the sidewalk: Ethnography and writing race[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 2006, 29(3).
- [40]Harvey, David. Examining the link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capitalism[J]. New Left Review ,2008,53.
- [41]Hart, Keith .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in Ghana[J].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973, 11(1).
- [42]Hans F. Illy. Regulation and evasion: Street-Vendors in Manila[J]. Police Sciences ,1986, 19(1).
- [43]Lefebvre, Henri . Writings on Cities [M].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ard, 1996.
- [44]Veronica Crossa.Resisting the Entrepreneurial City: Street Vendors' Struggle in Mexico City's Historic Cent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9,33(1).
- [45]Michael G. Donovan. Informal Cities and the Contestation of Public Space: The case of Bogotá's Street Vendors 1988-2003[J]. Urban Studies,2008, 45(1).
- [46]Molly Hurley, James Trimarco . Morality and Merchandise: Vendors, Visitors and Police at New York City's Ground Zero [J].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004, 24(1).
- [47]Portes, A. ,Castells, M. ,Lauren A. Benton. The Informal Economy: Studies in Advanced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
- [48]Purcell,Mark.Excavating Lefebvre.The right to the city and its urban politics of the inhabitant[J].GeoJournal , 2002(58).
- [49]Silver, Hilary,Daly, Mary .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capital: A comparison and critique[J]. Theor Soc , 2008(37).
- [50]Setha M. Low.The Anthropology of Cities: Imagining and Theorizing the City[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6(25).
- [51]Sharit K Bhowmik,.Street Vendors in Asia: A Review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J].2005(6).
- [52]Simone, AbdouMaliq. For the city yet to come: changing African life in four citie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53]Stoller, Paul .Crossroads: Tracing African paths on New York City streets [J]., Ethnography,2002(3).
- [54]Sveinung Sandberg. Street Capital: Ethnicity and violence on the streets of Oslo[J]. heoretical Criminology2008, "" T,Vol.12(2).

[55]Tola Olu Pearce, Olufemi O. Kujore, V. Aina Agboh-Bankole . Generating and Income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The Experience of Street Food Vendors in ILE-IFE[M]., Nigeria. Africa,1988.

[56]Wacquant, Loic. Ghettos and Anti-ghettos: Anatomy of the New Urban Poverty[J]. Thesis Eleven, 2008(94).

[57]Walter E. Little. Living within the Mundo Maya Project: Strategies of Maya Handicrafts Vendors [J].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008(35).

[58]<http://www.wiego.org/> WIEGO (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zation and Organizing)

[59]<http://www.ilo.org/global/lang--en/index.htm>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60]Francic Lund 2003, "People working informally: negotiating the use of public space in Durban city", World Bank Urban Research Symposium 15th to 17th Dec.2003.

法律法规：（见脚注）

附录一：田野调查人物罗列表（部分）

江西上饶	甜橙	女	游击（三轮车，小区门口）
安徽	水果（过年卖炮竹）	女	游击（三轮车，小区门口）
江西	玉米	夫妻	游击（小推车，学校周边）
江西	黄蕉苹果	男	游击（三轮车，小区门口）
安徽	水果	男	游击（三轮车，学校周边）
安徽	水果	女	吴涇镇步行街外面，2009年2月份被取消，存在了1年多的时间
回沪知青	水果	男	同上（取消后，靠积累的本金租了一个沿街店铺继续水果生意。年租金7万元。如果按照规定进室内市场的话，800元月租金）

江西	水果	夫妻	大卡车上（货物摆放在大卡车上，开到哪里，停下来就做生意；有人来抓就马上开车逃跑）
江苏	外语期刊杂志 (<i>Time, Economist, Newsweek, Le Point, Reader</i>)等	男	学校门口，依靠在 24 小时便利超市的橱窗框架上摆放杂志，成为不占据“公共空间”的摊贩
上海人	二手书（10 年前经营钱币收藏，1997 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的通知》后改在文庙经营旧书生意；2006 年黄浦区文化行政执法大队启动严惩“路边书摊”后开始打游击	男	学校门口，车站对面，只做中午生意
	盗版新书（管得紧时考虑到重量，改卖包包等）	男	学校门口
	手机贴膜，手机配件	男	学校门口
	水果	女	学校门口（始终不固定地点）
	夏天卖凉皮，冬天改卖煎饼（10 多年了）	女	学校门口
	小杂货（拖鞋、衣服等）	夫妻	学校门口
浙江上虞	雨伞（老家特产，直接批过来）	男	清晨曹阳八村农贸市场门口，中午学校，晚上租房附近的学校
	各式帽子	男	原先是个厨师，之前在武宁路做了 6 年生意，武宁路被整治后来到学校门口
安徽人	女装（白天淘货，晚上出来卖）	女	之前在武宁路做了好几年
	睡衣（当季服饰）、包包	男	原先是个美发师，憧憬自由做生意的生活，在武宁路做了几年生意

Street vendors in the city: the flexible protest besides the planning

Li Jialin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ethnographic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street vendors who are the main part of informal economy in the city. To see “streets” as the important social structure and space structure of the cit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pecial relation between the street vendors as actors and the “streets”, and moreover, this paper also start to image and analyze the problems like “ the paradox logic of street world”, “city orders” and “the flexible protest” of urban underclass.

Key words: street vendors, informal economy, street world, flexible protest